

# 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

■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如果凯恩斯只须应付他的批评者的刺激，那末他无疑有责任重新起草《货币论》中的某些部分一遍使他的那些论点更充实而且清晰。然而，当时他的思想正在前进。他在探索与简化一般法则。他再次进入了一条漫长的隧道，并最终带着《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从隧道中走了出来。”（1936 年）

有深入了解哈耶克与凯恩斯的上下两篇的商榷文章和凯恩斯的回应的背景和其中涉及的问题，才能解读出整本《通论》都好像自始至终均是在与哈耶克进行深入的理论论战这一点。在当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学界，好像并没有多少人能够认识和体悟到这一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凯恩斯在《通论》中是如何与米塞斯、哈耶克和罗宾斯进行正面商榷的。在第 14 章的附录最后一节，凯恩斯指出：“冯·米塞斯教授提出了一种奇特的利息理论；该理论为哈耶克教授所接受，我认为它也为罗宾斯教授所采纳。这一理论是：利息率的变化也就等同于消费品价格与资本品价格的相对变动。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并不清楚。但是，其论证似乎遵循下列方式进行：通过某种异常简单化的方法，新消费品的价格和新投资品的价格之间的比例被认为是可以衡量资本边际效率率。这一比例又等同于利息率。根据利息率降低有利于投资这一事实，因而他们得出消费品价格和投资品价格之间的比例降低也有利于投资。”凯恩斯接着指出：“通过这种办法，一个人的储蓄与投资总量增量之间的关系就被建立起来了。人们普遍认为，个人储蓄的增加可以造成消费品价格的下降，而下降的幅度很可能要超过投资品价格的下降幅度；因此，根据上述推理，降低利息率会刺激投资。”凯恩斯还认为，“当然，某些资本资产的边际效

率下降，从而整个资本边际效率曲线的下降，与上述论点正好有相反的作用。其原因在于，资本边际效率曲线的上升和利息率的下降都能刺激投资。由于把资本边际效率与利息率混淆在一起，米塞斯教授和他的门徒们恰好得出了与正确结论相反的结论。”

到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哈耶克与凯恩斯的争论，实际上仍然还是沿着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与实际利率（到《通论》阶段，凯恩斯本人已经不再使用“自然利率”这个魏克赛尔式的概念了，而是用“资本边际效率”来替代之，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和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说白了，到这时候，尤其是在 1929—1933 年的大萧条发生后，米塞斯、哈耶克和罗宾斯仍然从理论上坚持不要人为干预市场经济的自然运行，尤其是不要人为操控利息率来错配资源，导致资本品需求的扩张，人为制造过度投资和短期繁荣；而凯恩斯这时则全力思考如何在短期内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和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从而把各国经济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实际上，就连凯恩斯本人也清楚他的分析理路注重短期而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注重长期这一点。譬如，在前面评论米塞斯、哈耶克和罗宾斯的简单逻辑推理后，他在一个注脚中写道：“如果我们处于长期均衡状态，这可以在特殊的假设条件下得以成立。但是，如果所涉及的价格是萧条状态的价格，那末，认为企业家在形成他的预期时会假定价格永久不变这一简单化的办法肯定不符合事实。”

在后边第 17 章，凯恩斯又对他在《货币论》中的观点进行了反思，并进一步与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做了区别。他说：“在我的《货币论》中，我把我意图中的唯一利息率称之为自然利率，并且对它下了定义——用我在《货币论》使用的名词来说，即使储蓄率和投资率相等的利率。我当时相信，我的定义是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的发展和明确化。按照他的说法，自然利率是能保持没有被他很明确地加以界定的价格水平稳定性的利息率。”接着，凯恩斯还进一步解释道：“然而，我在当时所忽视的事实是，根据这个定义，任何社会在每一就业水平上都会有一个不同的自然利率。同样，相对于每一数值的利息率，都存在一个使该利息率成为‘自然率’的就业水平；其含义是，在该自然利率和就业水平上，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就此而论，不管就业水平如何，来谈论自然利率，或根据上述定义就可得到唯一的利率，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在当时，我还没有懂得，在一定情况下，经济体系可以处于小于充

分就业的水平。”基于这一反思，凯恩斯明确地讲述了他在《通论》中的新理论发展了：“我现在认为，过去被我当作在学术发展上似乎是最有前途的‘自然’利率概念，对我们现在的分析来说不再是很有用和具有多大的重要性。它不过是维持现状的利息率，而一般来说，我们对维持现状本身并没有多大兴趣。”

从这长长的三段话中，我们一方面可以找出凯恩斯本人相比《货币论》阶段上在《通论》中的理论进展，也另一方面印证了正是与哈耶克的理论大论辩，促使他完成了他的理论的革命性的转变，即从对魏克赛尔式的“自然利率”的概念分析转向对“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分析和重视。

在完成这一根本性的理论转变后，凯恩斯最后非常明确地表述道：“我相信，经济周期最好应被当作系由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性变动所造成的；当然，随着这种变动而到来的经济体系中的其他重要的短期变量会使经济周期的情况而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沿着这一思路，凯恩斯构建了他的经济周期理论：“对危机的更加典型的而且往往是更加决定性的解释在基本上并不是利率的上升，而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正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所以萧条才如此难以治理。……要恢复资本边际效率并不那样容易，因为资本边际效率在目前系由无法控制的（uncontrollable）和不服从的（disobedient）工商业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用普通语言来说，在个人行为自己作主（individualistic）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信心的恢复远非控制所能奏效。”

由此凯恩斯得出了他的政府干预市场的基本思想：“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除非投资市场的心理状态使自己做出毫无理由这样做的巨大逆转，要想避免就业量的剧烈波动是不可能的。我的结论是：安排现行体制下投资的责任绝不能被置放在私人手中。”凯恩斯还具体解释道：“鉴于资本边际效率日益为基的下降，我支持旨在由社会控制投资量的政策；与此同时，我也支持各种提高消费倾向的所有政策。其原因在于，在现有消费倾向下，不论我们对投资采取任何措施，想维持充分就业均是不可能的。因而，存在着用两种政策同时操作的空间——既促进投资，同时又促进消费。”

到这个阶段上，主张政府在经济萧条中应主动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使经济体系中从萧条中复苏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就基本形成了。

## 经济学应告别传统价值论

■ 滕泰 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



如今，物理学已经前进了几百年，而经济学的基础价值理论却仍然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纪——让理论和实践的冲突天天发生，让企业家和投资者们在黑暗中靠着直觉摸索前行——这不仅是经济学的悲哀，也是哲学和所有社会科学的悲哀。

之后，我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晏智杰教授作了深入而兴奋的交流。晏教授早在光华管理学院分立出来之前就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作为国内政治经济学鼻祖级的人物，他居然也高度赞同我的理论，并且满怀激情地向我介绍了他的“新价值论”。

多年来，当我在不同场合介绍我的“软财富”理论时，在投资界得到了令人吃惊的认同和呼应。一批又一批专注于金融、书画、文物、邮票、影视、奇石、信息产品经营和研究的朋友听了都如获至宝，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原来，这些企业家和投资人由于缺少正确的理论给他们经营的商品定价，不但在实践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经常被误解为投机甚至欺骗。

2013 年，企业家彭中天先生和《英才》杂志社的几位主编几乎同时向我推荐了中航

多年来，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一走进中国大学课堂就要学习“劳动是唯一价值源泉”的理论。劳动固然创造价值，但是怎么能够因此而否定土地资源、资本、技术、管理等也是价值和财富的源泉呢？

笔者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采纳了类似“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提法——“让一切知识、劳动、技术、资本和管理的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然而，即便是五大财富源泉理论，也只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对“硬财富”世界的解释。有很多商品，比如，一手股票、一首歌曲、一个软件、一幅名画、一件古董、一场演讲，到底怎么测算其劳动成本、要素成本？

事实上，金融产品、知识产品、信息产品、文化产品、服务业产品为代表的“软财富”和“软产品”本身并不属于牛顿物质世界，而是属于爱因斯坦以后的相对论、量子理论、不可测理论、宇称不守恒理论的微观粒子世界、高速运动的世界，以及人类思维的世界。在这样的软财富世界里，“软商品”不但没有固定劳动价值可计算，也很难有固定的物理成本，更没有确定的效用和供求关系。如果固执地按着“硬物质”世界的规律去认识和分析它们，就会每天犯错误，并且给经济实践和财富管理带来巨大的损失。

传统经济学教科书所传授的劳动价值论、三要素成本定价理论、内在价值或效用价值理论、供求关系曲线理论，都是 20 世纪以前的学者发明的，都是诞生于牛顿时代的世界观和哲学观。如今，物理学已经前进了几百年，而经济学的基础价值理论却仍然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纪——让理论和实践的冲突天天发生，让企业家和投资者们在黑暗中靠着直觉摸索前行——这不仅是经济学的悲哀，也是哲学和所有社会科学的悲哀。

为了更新人们的财富观念和价值理论，十多年来我先后出版了《新财富论》、《财富的觉醒》、《民富论》等著作。虽然依然不能扭转经济学界关于价值论的传统误区，但是也产生或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共鸣。

比较值得一提的学术共鸣，首先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创始人、前院长冯春安教授。作为研究和讲授了半生政治经济学的专家，他看了我的新财富和价值理论之后，首先表示高度认同。

对哈耶克细读过他的《货币论》后而提出的周详、深入而十分尖锐的商榷与挑战，凯恩斯则只是敷衍地回了一枪，就没再继续讨论下去。这一事实既不明凯恩斯弃甲而逃，也不是说明他对哈耶克的批评不重视，而是他在梳理自己的思想，在不断明晰他自己的理论，或者说在哈耶克的步步紧逼的批评与商榷中进行新的理论创新。正如目睹过这一场论战的《凯恩斯传》的作者哈罗德所言：“如果凯恩斯只须应付他的批评者的刺激，那末他无疑有责任重新起草《货币论》中的某些部分一遍使他的那些论点更充实而且清晰。然而，当时他的思想正在前进。他在探索与简化一般法则。他再次进入了一条漫长的隧道，并最终带着《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从隧道中走了出来。”（1936 年）

现在看来，哈耶克对凯恩斯《货币论》的抨击与商榷，无疑刺激了凯恩斯去进一步理清他自己的思想和术语，去写作《通论》这部 20 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因此，我个人判断，如果说哈耶克对凯恩斯的理论论战不是凯恩斯写作出《通论》的原动力的话，也是最重要的推动力或言促动力量，或至少我们今天可以认为，凯恩斯在《通论》中所形成和阐发出来的最主要的经济学思想，是在哈耶克的步步紧逼式的商榷和批评下逐渐形成和明晰出来的。根据这一点，我近几年来一直认为，凯恩斯的《通论》很大程度上是哈耶克与凯恩斯论战的结果，或至少可以说，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论战，催生了凯恩斯的《通论》这部 20 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

我的这种判断，可以从《通论》的整个文本中多处可以解读出来的。在《通论》序言中，凯恩斯开篇第一句话就说：“本书主要是为同行经济学家们所撰写的。……我的意图是想使辩解和争论尽量少一些。”他还在第一段中明确说：“如果使分歧明确化，我在争论中的文字太过尖锐，那么，我必须请求原谅。”在已经清楚地知道之前发生的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论战的情况下，现在我们会自然理解凯恩斯这里的话是说给谁听的了。在“序言”中，凯恩斯还实际上在向哈耶克的批评和论战致意：“撰写这样一本书，笔者沿着陌生的道路摸索，如果想要避免过多的失误，他必须极度依赖批评和对话。如果一个人单独思考太久，什么愚蠢的事情都可以信以为真了。”从这些话中，我们能读得出来，凯恩斯在撰写《通论》时，一直是把哈耶克的商榷和论战的观点作为他的写作的潜意识和论敌之中。对于这一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的作者韦普肖特也体感到了：“《通论》隐含着对哈耶克及其同道所下的书书（invitation），希望他们就此做出回应。”

不仅如此，在写作过程中，凯恩斯在很多地方对哈耶克的经济理论和“古典学派”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尤其是对米塞斯、罗宾斯和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进行了“一轮无情的攻击”，这也间接说明，《通论》的写作、凯恩斯思想的明晰化和理论进展，均与哈耶克对他的理论批评与商榷有直接的关系。根据哈罗德的回忆，到 1934 年底，《通论》的初稿就完成了，在次年进行修改，并与评论家门进行广泛联系——“他虚怀若谷地接受种种建议，不辞劳苦地对大家所提出的疑点详尽作答；凡有歧见之处，则努力长篇论述加以解释，这令批评者们心悅诚服。”（Harrod, 1951）尽管如此，据哈罗德的回忆，在看完初稿之后，一些经济学家朋友还对凯恩斯对哈耶克及其同道的严厉攻击大感震惊，多次劝说凯恩斯不要太针对个人：“我所做的主要努力在于减弱他对‘古典’学派的攻击的烈度。……在我看来，这一断言使他的批判有过犹不及之虞，将酿成巨大的骚动并引起无关宏旨的争论。”

尽管哈罗德等经济学家曾努力劝说凯恩斯不要在《通论》中对古典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埃奇沃思、庇古）以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和罗宾斯进行激烈的攻击，但在《通论》的第二稿中，乃至在 1936 年出版的《通论》中，我们今天可以处处读出他对哈耶克的经济观点观点和商榷的批评甚至某些嘲弄。譬如，在《通论》第三章中，凯恩斯说：“传统经济理论的众所周知的乐观主义，已使经济学家们被看成是甘迪德（Candide）式的人；他离开了现实世界来耕种自己的园地，并且教导人们，只要听其自然，在可能的最美好的世界中的一切都会走向最美好的路径。我认为，这种状态可以归之于他们忽视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所造成的对经济繁荣的障碍。在古典经济学派的假想的社会中，显然会存在着资源最优使用的自然趋势。古典理论很可能代表我们的经济应该运行的方式。但是，把现实世界假设为这样，就等于把我们的诸多困难给假设掉了。”很显然，凯恩斯这里是把哈耶克及其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比喻为一种甘迪德式的人物，并从而也解释了他自己的经济学与这些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不同。

在其后，谈到哈耶克在与他争论中谈到的“自然利率”即“中性的”和“均衡的”利率以及“强迫储蓄”等概念和思路时，凯恩斯甚至尖刻而调皮地嘲弄道：“野鸭子已经潜入到水底，深入到它力所能及的地方，并且紧紧咬住水草、须根和水底的一切垃圾不放，因此需要有一只聪明异常的狗潜入到水中，重新把它捞上岸来。”凯恩斯对哈耶克以及他所谓的“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的讥讽，也是真够形象和辛辣的！

2008 年，我与中美战略研究院的谭伟东院长共同去厉以宁先生家中探望，送给他我的《新财富论》，厉老师则送我他的《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下），并亲手上签上他和他夫人的名字。我当时就想，我写《新财富论》时，原本以为自己够沉得下心、够耐得住寂寞了，但是拿到《罗马拜占庭经济史》才知道跟厉老师这代人差得远呢！虽然感悟，但是这两本书放在家里很久还是没有读完。2009 年，偶遇厉老师的关门弟子程志强博士，程先生告诉我：你的那本《新财富论》厉老师看了，本来一直放在他家书架上，如今已经在我手上了。

2012 年，我又收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的毛笔来信，他是长期在理论研究、国家战略政策制定、教育等战线工作的老前辈，现任中欧国际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的刘吉先生。刘老在听了我的演讲后，嘱咐我一定把《新财富论》和《财富的觉醒》寄给他，收到我的书之后随即写来亲笔信说：“看到你们年轻人，中年年年年有新作，真是羡慕不已。抓紧机遇，著作等身吧！我老虽老矣，但是学习精神不减。您的大作我会抽空阅读的，如有心得，当再与您交流。”

之后，开始与刘老偶尔有学术交流。除了得到刘老的鼓励和支持，值得一提的还有他开放的学术研究态度对我的启发。有一次我去看望刘吉老师，和刘老师还有秘书小李一起在中欧商学院的校园里散步。当我提到自己想组织一个真正有志于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研究的青年学者论坛的时候，我说：“我想邀请那些有真知灼见、有创造性的学者，按着建设性的原则去搞研究，不要让那些思想太左的、太右的参加。”刘老却摇头说：“这个倒不一定，90 年代我在上海的时候，开座谈会就经常把左的、右的学者都请过来，让他们都发表意见，而且让江泽民同志坐在那里听。听一听又如何？”后来跟江总书记到了北京，我也把各方面的学者都请过来讲……“学术研究思想要开放……”

除了得到上面学术前辈思想的鼓舞和启发，林左鸣先生的支持和鼓励更值得我感谢。当我抱着试试看的心里，托好友彭中天先生问一下林总是否能写个推荐后，林左鸣先生不但一口答应，而且专门抽了一个周末的时间亲自执笔写了本书的序言。